

■书香茶座

《在伊犁》中的“人物”及其生命意义

□丛新强

王蒙的《在伊犁》各篇章集中发表于1983年至1984年间。如同《青春万岁》里的中学生人物群像,《在伊犁》中的维吾尔人物群像也仿佛天然生成。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朴素观念,他们身上真善美的精神以及纯粹的人际关系,让人物自身与作者回归了本真的“自己”。

那位让我”感激不尽的穆罕默德·阿麦德,无论遇到什么波折,始终热情、礼貌、谦和、文明。他天资聪颖且好学,爱看电影、读书,也爱唱歌跳舞,对生活满怀希望;然而在他人眼中,他却因不爱劳动、行为风格被误解为“性别模糊”,常遭取笑与轻视。他注重维护民族团结、沟通民族感情,同时不畏权势,敢于和工作队干部据理力争。自身生活艰难时,他仍送来鸡蛋关心“我的身体,并信守承诺;追求诗意生活与爱情的同时,还竭力成全意中人阿依努尔的婚姻选择。他对妻子阿娜尔古丽照顾有加、倾心付出,始终心怀理解、感恩。即便心怀流浪的梦想,最终也选择回归故乡、面对祖国。阿麦德身上充满矛盾与挣扎,却始终凭借劳动自食其力,尽显高贵品质。正如他敬畏的诗人诗作所言:“烛光虽小,却照亮了一间屋子——因为它正直;闪电虽大,却不能留下什么——因为它弯曲。”在“多普卡”队进村的特殊背景下,王蒙笔下的阿麦德展现出正直特质,

这不仅是对他人的照亮,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特定氛围的一种消解。

木匠马尔克看起来像个“傻郎”。因被阻拦去早市卖货,他会耐心地与民兵辩论;因口粮被扣发,他也敢昂高地与队长理论。马尔克不仅有着匠人极为严谨的敬业精神,还对“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的人性命题有着敏锐思考。更甚者,他还以颇具禅意的方式,提出了“人是什么”的终极之问。他说,人是沙子——风往哪里吹,便往哪里去;若没有风,原本不相干的沙子,也无法汇聚到一起。这“人是沙子”的说法,恰好呼应了房东老大爷穆敏“人就是带傻气的种子”的论断。“沙子”与“傻子”,看似偶然巧合,实则异曲同工。

有着“淡灰色眼珠”的阿丽娅,展现出端庄、慈祥、悲哀与矜持。她深知自己身患疾病,因此想在世时为马尔克寻觅一位伴侣,而黑眼珠显得格外大的爱莉曼姑娘正是最佳人选。可马尔克这边,却在忙着张罗卖房,只为给阿丽娅凑钱治病。爱莉曼也为了马尔克,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这三个人物,就这样彰显着各自美好的心灵与深厚的情意。阿丽娅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马尔克与爱莉曼成婚。她表示,如果马尔克不忍心在她还在世时先办理离婚手续再与爱莉曼结婚,那么,他们俩需向她保证,在她离世

后的3个月内完婚,如此她便能含笑九泉。然而,马尔克犯了“傻气”,无论他人如何劝说,始终没有顺从阿丽娅的心愿,最后回归木匠本行。爱莉曼同样犯了“傻气”,因爱而不得,一气之下嫁给了给人沉重压抑感的老裁缝阿卜杜拉赫曼,令人唏嘘不已;最为博爱悲悯的阿丽娅,又何尝不是清醒自觉地犯着最大的“傻气”——坦然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一心成全所爱之人。马尔克、阿丽娅、爱莉曼既是三个“傻子”,又是三粒“沙子”。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但每个人的灵魂,都深深震撼着我们。

房东大娘阿依穆罕历尽苦难,饱经沧桑。她失去了父母、姐姐,也失去了所有孩子,只能依靠苦茶填补生命的空白,将最快乐的时光都留在了苹果树下。而穆敏老爹,虽缺乏认识世界的文化知识,却不乏洞察世事的实践智慧。他郑重地谈到“想死”,认为人应该时常想到死亡,如此才会心存敬畏,不去做坏事,只做好事,坚守正道。这不正是“向死而生”的体现吗?他们不贪婪、不懒惰、不嫉妒,既不疲沓浮躁,也不尖刻软弱。读者总能从回忆他们的过程中获得启示、汲取力量、得到安抚。人物的内在品质在此升华。

“好汉子”伊斯麻尔同样是个独特的人物。从其完整的生命历程来看,他并非简

单的“野心勃勃”,而是复杂多面的“智勇双全”。伊斯麻尔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也是颇具领导力的管理者。他狠抓劳动纪律,积极推广技术革新,既可以说会道,又敢于实践;但他也会紧跟形势、见风使舵,甚至存在多吃多占的行为;在受到批判时,又善于认错、主动自我检讨。正如作者对其人生的总结,他宛如一个演员,登台表演时有声有色,叱咤风云、不可一世,戏散卸妆、收起行头后,便心平气和地换上普通衣衫,融入人群之中。

王蒙的写作回归了最为可靠的“真实朴素”,于看似毫无技法之处“还原”人物形象。《在伊犁》融合了源于生活本真的诗性语言、叙事散文的笔法与“非虚构”的方式,构成一篇篇饱含“土地”深情的人物传记。“土地”与“人物”共生共存,在作者心中皆具神性意味。如王蒙所体会到的,这是一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壤。王蒙的“在伊犁”岁月,真正实现了“思想改造”,并在此过程中凝聚成更为永恒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丹丹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作家之一。在题材上,黄丹丹与其他青年作家或描摹乡村风景,或瞩目都市经验不同,她立足家乡所在的县城——安徽淮南寿县,着力挖掘这个小城的生活经验与文化传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我们描绘了新时代古城的一幅幅浮世绘。黄丹丹的小说如同一个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都以其细腻的笔触、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吸引着读者。

中国的县城是政治文化的关键环节,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之说,即外来的权力只统治到县一级,县以下基本是乡绅与宗族共治,这让各地保留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中,新的组织动员能力直接抵达每个村庄,但县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仍然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在文学上也是如此,通过一个县城的面貌我们可以具体而微地感知到丰富的中国经验及其在时代中的变化。柳青在《创业史》描述了1950年代初陕西关中地区一个县委书记朱明山带领村

民消灭棉花害虫的故事,小说呈现了共和国初期的蓬勃朝气。路遥《平凡的世界》描述了从双水村到一个省的改革全景,其中原西县城是重要节点,向上连接到黄原地区和省里,向下通达到石圪节公社和双水村,小说也从整体上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充满希望与奋斗的时代精神。张楚《云落》则描述了一个县城新世纪以来的面貌,让我们从细密的文字中感知到中国的迅猛发展及其带来的变化。

黄丹丹的《天鹅之舞》也是这样,她以专注热情的眼光关注着县城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并将其转化成一篇篇小说。需要提及的是,与上述作家笔下的县城不同,黄丹丹所在的县城安徽寿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积累。寿县古称寿春、寿阳、寿州,曾是楚国最后19年的首都,也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撰写《淮南子》之地,著名的淝水之战、陈庆之北伐、赵匡胤讨南唐都发生在这里。青苔斑斑的寿州古城初建于北宋初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有国内少有的保存完整的古代城池。穿过古城东门,可以看到门下的青石板路已被轧出一道道车辙,那是历史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饱含着岁月的沧桑。生长于这座古城的黄丹丹,深受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她笔下的县城自然与其他作家不同。

其一,黄丹丹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其小说的题目《莺梦行》《南有嘉鱼》《归去来兮》《夜静春山空》《云深不知处》《北方有佳人》都取材于古典诗词,含蓄蕴藉而有意味,以古诗为题书写当代人的生活,在古今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也让当代人的生活有了文化和传统的底蕴。《南有嘉鱼》的标题来自《诗经》“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小说聚焦小城中两个孪生姐妹的关系,描述了她们从别扭、紧张、猜忌到最终误解消除,重归于姊妹深情的过程,博物馆、非遗、古典诗词等文化要素点缀其中,呈现了一幅古城寿州的当代家庭生活图景。《北方有佳人》的标题则来自西汉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小说以传统佳人的意象,切入对家族历史真相的追寻,作者将人物的爱情婚姻置入社会与时代之中,爱与牺牲成为小说贯穿的主题,也让我们看到了多年前战友之间的情谊。《故事里的人》同样追溯家族历史的隐秘角落,曾经分属敌对阵营的两家,在儿女亲事之间反复撕扯,贯穿了不同的时代,也让我们看到了信仰与真情的力量。在《花窗》中,“花窗”既是寿县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花窗作为传统建筑中的元素,既分割空间又联通内外,在小说中承载着主人公对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幻的复杂情感,透过花窗,读者得以窥见历史的意外巧合、人物隐秘的情感和生活的斑驳痕迹。

其二,黄丹丹小说善于写家庭关系与情感关系。《天鹅之舞》关注夫妻关系与同学关系,在对往事的追忆与拼凑中,过去发生的故事终于清晰,他们已入中年,对逝去的爱人仍然无法释怀,但也只能以“天鹅之舞”回到曾经的青春。《云深不知处》关注单亲母亲梁茗茗与女儿的关系,小说以她对女儿轻易投奔异国父亲的不甘入手,细腻真切地呈现了一个母亲内心深处复杂而痛苦的情感,女儿在视频通话中的表白,终于让母亲接受了女儿的远离,也将勇敢面对自己的孤独。《飞翔的列车》描述梦秋在列车上与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子偶遇的故事,在行进的列车上他们都在回忆,但自曾经的亲密无间到现在的彼此客气,中间已经隔了21年的时光,小说写出了人生与爱情的无奈。《消失的朱迪》描述曾经共同成长但消失在异国他乡的朱迪,曾经的深情化作了时间流逝中的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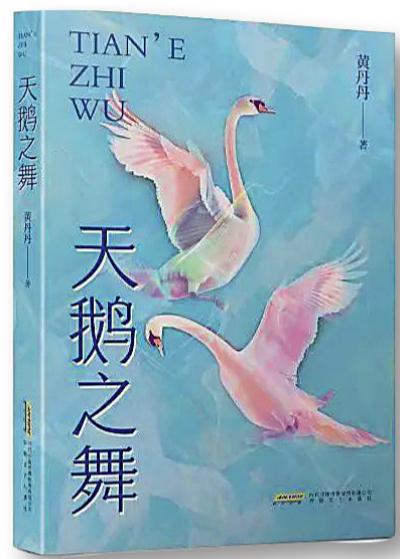
其三,黄丹丹小说擅长捕捉新时代的新经验。《莺梦行》以“朱萸几乎如逃难般回到了古城寿州”开头,描述了朱萸在成长过程中与姐姐、妈妈、故乡以及“他”的关系,在平淡的叙述与留白中给读者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归去来兮》描写留学澳洲的沈竹心与父亲、同学、故乡以及老字号的关系,小说的开头是“耗资1000澳币,耗时二十多个小时,沈竹心从悉尼回到了家乡”。《夜静春山空》的开头是“午后,母亲站在窗前,缓缓地转过身,对坐在餐桌旁处理邮件的余凡说:‘凡凡,我想回趟寿州。’”小说在他们回寿县的过程中以冷静舒缓的笔调展开了对小说主人公余凡身世的揭秘,原来他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小说将戏剧化的故事安排在“夜静春山空”的场景之中,颇具反差感。从这几篇小说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离去之后又归来的寿州人,这不仅拓展了作者的创作题材,也展现了古城寿州在新时代的魅力。

黄丹丹的小说在叙事上,善于运用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视角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场景。她的作品主题丰富多样,涉及到人性、情感、理想、现实等多个层面,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新时代古城寿州的生活场景,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故事的魅力,又能引发对生活的思考。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新时代古城的浮世绘
——黄丹丹小说集《天鹅之舞》序

□李云雷



《天鹅之舞》,黄丹丹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

“游侠”杜甫的文学再造

——评彭志强《秋风长啸:杜甫传(上部)——游侠杜甫》

□庞惊涛

讲述杜甫少年时期在洛阳的生活时,彭志强不仅详细介绍了仁风里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还通过杜甫的诗作以及他与二姑母杜氏的故事,展现了儒家仁爱思想对杜甫的深刻影响,让读者看到一个在仁爱的环境中成长,心怀悲悯、立志高远的少年杜甫。

对位遐思,是彭志强这部作品的又一创作特点。诗人的敏感、深沉和多情,在追踪行旅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彭志强或驾车、或徒步,沿着杜甫当年的足迹,或驻足、或徘徊、或遐思,将自己考察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融入对杜甫人生轨迹的叙述中,使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与杜甫一同感受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当然,这种双线叙事并非简单的叠加或随意的对位遐思,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映衬。杜甫的人生轨迹为作者的考察提供了方向和内容,而作者的考察则为杜甫的人生增添了细节和情感。两者相互融合,使得《游侠杜甫》既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创作的灵动性。

还原杜甫的多面人生。杜甫在大众的认知中,往往是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诗圣形象。彭志强在《游侠杜甫》中,通过诗意图打破了这一固有印象,还原了杜甫丰富多彩的多面人生。在我看来,至少有两条线的清晰梳理,成就了该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再造价值。

一是用大量的篇幅确认杜甫的“游侠”特质。作者认为,杜甫并非天生苦命苦情,出身名门,有着皇室血脉,祖母李氏祖上可追溯到唐太宗李世民,祖父杜审言是皇帝近臣。杜甫崇尚侠义精神,他擅长骑射,气宇

轩昂,嫉恶如仇。从他的《壮游》《遣怀》《昔游》等诗中,都能找到他对自己这一时期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描述,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从台上,冬猎青丘旁”。在与李白、高适等好友的交往中,杜甫也展现出了他的豪爽与仗义,他们一同饮酒作乐、谈诗论道,梦想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二是深入考究挖掘出杜甫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丰富情感,以佐证其“游侠”的生成过程。杜甫早期诗作中除了展现出他的壮志豪情,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他会为公孙氏的舞蹈而感动,写下“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的诗句;会为自然美景而陶醉,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出他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而在经历了人生的挫折后,杜诗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美好的信念。彭志强对杜甫诗作不仅仅是简单引用和解读,更是通过自己的文字,将杜甫的情感世界生动地展现出来,让读者能感受到杜甫在面对人生起伏时,所经历的喜悦、悲伤、愤怒、无奈等复杂情感,使杜甫的形象更加真实、亲切。

探寻诗圣成长密码。“游侠”只是杜甫的一个阶段性标识,彭志强的杜甫诗路探寻,根本的目的还在于,“见证”或揭示杜甫由“游侠”迈向诗圣的过程。就此,我倾向于认为,《游侠杜甫》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杜甫形象,更在于它深入挖掘了杜甫成长为诗圣背后的文化内涵,为探究诗圣的成长密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学密钥。

从家族文化来看,杜甫出生于一个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和政治背景的家族,远祖杜预文武双全,是三国时期的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杜甫认定“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其诗学自信正源于杜审言。杜甫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远大抱负,立志要在政治和文学上有所建树。书中通过对杜甫家族历史的梳理,让读者看到了家族文化对杜甫成长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杜甫诗歌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感的根源。

再从时代背景看,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的一生经历了开元盛世的繁华,也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和社会的衰败。这种时代变迁对杜甫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他的诗歌更加深刻地进入底层民众残酷的生活环境,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书中详细描绘了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将杜甫的人生经历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杜甫思想转变的原因:圣人之所成就,在于他放下“小我”的成败幻空,升华了对众生的观照和同情。

另一条隐秘的叙事逻辑是,彭志强以今日诗人之心,推求杜甫诗歌理念的生成过程,这是人与艺相互促进、相互生成的过程。杜甫何以在继承前人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提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理念?何以运用多种诗歌形式进行创作,使律诗、绝句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他的诗歌语言何以如此精炼、生动,富有表现力?这些问题,彭志强在书中都有比较系统的回答。

(作者系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

理性驾驭下的感性之美

□尹子仪

态度。而在专门讲述乡村人物的散文集《乡野闲人》中,作家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理念:“我用二十年的光阴,与他们一日日为伍。当我将他们一一记下,我便觉得自己像一只虫子,寻到了湿润的泥土,我蜷缩在万千植物的根茎之间,觉得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是安稳的,亦是可以忘记的。”

作为大学老师,安宁笔耕不辍,既有知识分子的博学与才华,更有对待学生的责任感。在散文《一个大学老师的教书手记》中,安宁对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差生”,抱有很大的关怀与理解。安宁从小生长在齐鲁大地上一个小小的贫穷村庄里,如野草般恣意舞动着生命的枝叶,通过读书成为大学教授、作家,一路艰辛只有自己知晓。正是靠着永不妥协的信念,她不停地与困难进行着抗争。安宁散文之所以会有直面现实的呈现,很大程度上与她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关。

“间离”。安宁和李娟的散文在题材上有着相似之处,一个深耕山东和内蒙古大

地,一个专注于新疆大地。李娟的散文是亲历的、在场的写作,而安宁的散文则是一种旁观式的写作。在安宁的写作理念中,她最认可的其实也是“生命写作”和“地域写作”。虽然从表面上看,她和李娟的写作非常相似,但细细读来却大为不同。安宁的散文有着迁徙漂泊之感,写自身的境遇、哀愁与不如意、困顿中强装的镇定,热切之中有冷淡之感。

譬如,安宁以山东泰山脚下的故乡为背景的《乡野闲人》,和以第二故乡呼伦贝尔草原为背景的《草原十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间离”之感。前者来源于乡村痛苦的记忆,后者则源于旅行造就的视角。作为一个外乡者,不能充分融入当地的牧民群体,不可避免要采取旁观者的视角。而对自己童年故乡,多年后溯流而上,村庄的一切已物是人非,于是不得不以外来者的身份去反刍,将对故乡的爱恨情仇以儿童的视角展现。归于和解后的平静,是安宁散文的深沉

思考。

“中间地带”。安宁在写作的时候,会受到文学机制、社会环境、写作心态和生命经验等多方面的制约。如果说她直面现实的一面,更多是冷静的审视,“间离”的一面,是她对万事万物无差别的广博的爱。那么两者合二为一,便是“中间地带”的复杂性。

在散文集《万物相爱》中,安宁除了使用上帝视角和成人视角,还展现出博物学家的一面,由此打通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得散文具有大开大阖的气象。尤其在她近几年创作的《乡野闲人》《草原十年》《万物相爱》等主题散文集或长篇散文中,没有“小格局”,倒是呈现出内蒙古大地般辽阔苍茫的“大气象”。

安宁秉持严肃的创作态度,怀着热烈的生命激情,试图为世间万物及卑微生命代言。或许可以说,任何优秀的散文都在“生命写作”的范畴中。

(作者系南昌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